

新时期『三农』事业

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

李凯中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新时期“三农”事业与农民 组织化问题研究

李凯中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三农”事业与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李凯中
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207-07444-7

I. 新… II. 李… III. 农业合作组织—研究—中国
IV. F32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9602 号

责任编辑:夏晓平

装帧设计:水木时代(北京)图书中心

新时期“三农”事业与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

李凯中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 印张 10.25
字 数 26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444-7/S · 104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序

中国农村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新型工业化的推进,特别是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为我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农村应该如何利用难得的历史机遇来加速发展,农业应该如何来应对新的挑战更好地发展?依靠谁来推进农村的社会进步?选择什么方式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些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湖南科技学院李凯中同志的新著《新时期“三农”事业与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对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农民组织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性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作者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考察了我国农民组织建设的历史与现状,深入探讨了新时期推进农民组织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系统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特质、类型和机制,明确提出了推进农民组织建设的途径和条件。该著作是近年来我国农民问题研究、特别是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读来令人深受启发。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发展的国家,与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的庄园制和农奴制不同,中国农村从先秦开始就是以家庭为基础来构建的。家庭是农民生活的基本单位,也是农业经营的基本组织,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来组织生产和参与社会活动,所以分散性是其基本特征。一些学者用“一盘散沙”来形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农民的分散性与集权化的专制政治体制互补组合,形成了长达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尽管农村中也普遍存在家族及其延伸的宗族组织,但其主要是处理一些公共性的事务,对于农民具体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没有多少组

织功能。这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和农民一直缺乏组织化的传统。直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在一些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和农业互助组,中国农民组织化才翻开了历史的一页。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潮推动下,几千年来分散自存的农民,迅速走向了组织化的道路,被纳入一定组织结构之中,农民都成了队员、社员,成为新的社会组织的一个分子。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织化,既是中国农民走向翻身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必然环节,其历史作用是勿容置疑的。问题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组织化运动,过于急迫,过于狂热,到后来成为脱离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水平,脱离农民现实需求的政治运动。农民的组织化不是依据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客观需要来推进的,而是按照主观意志来发动的;不是按照农民的意愿来进行的,而是以政治命令来推行的,这就必然使其陷入困境。

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延续了二十余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制度迅速走向瓦解,农村的集体组织已形同虚设,丧失作用。农民又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主体,“自己管自己,自己顾自己”成为新时期农民生存状况的基本写照。在改革开放初期,刚刚摆脱了外在组织约束的农民,其主动性、创造性被大大激发出来,借助家庭承包制的创新制度,我国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和农业一度成为改革最成功、最具活力的领域。然而,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家现代化进一步推进,农村、农业和农民又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分散的农业无法与大市场接轨,无法与现代化农业同步;分散的农民无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表达自己的诉求;分散的农民也无法推进建设农村的现代化,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条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三农问题”日趋严重,一些地方甚至恶化。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喊

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引发了人们对“三农问题”的热切关注和研究。

近几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特别是取消了农业税，免除农村中小学的学杂费，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努力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等。应该说，这些政策措施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并将进一步发挥积极和深远的作用。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进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实现农村、农业的现代化，不仅要靠政府政策的支持，更要靠广大农民的努力。农民是农村、农业的主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因素，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主力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人民群众要发挥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组织起来。因此，我国农民要承担推进农村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改变自己命运，就必须组织起来。列宁曾经说过：“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列宁的观点同样也适合于农民。我们也可以说，我国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有效去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

李凯中同志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村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长期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对“三农问题”有自己独到的体验和见解。去年，他来湖南大学做访问研究学者，和我谈到了他拟以农民组织化问题作为研究选题的设想，我深表赞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之间也经常进行一些讨论和交流，他对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给我启迪；他踏踏实实、认真执著的钻研精神，更令我钦佩！

本书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结合了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的新情况，对我国当前农民组织化中的新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其次，研究视野开阔，把农民组织化问

题放到新的时代背景,即经济全球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来分析,使研究有了鲜明的理论视角和时代特色;再次,著作材料翔实,内容丰富,论述系统,是一部用功很深,分量充实的学术专著。当然,新时期农民组织化问题作为一个探索性、甚至具有一定敏感性的课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不少难以把握之处,本书也不可能对农民组织化的问题都研究深透。对于农民组织化这样一个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人们会有多种多样的看法和观点,李凯中同志的研究也只是一家之言,这是它的局限,也是它的特色。我相信,该书的出版会为“三农”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我也期待,李凯中同志能够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去拓展和深化对我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研究,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罗能生

于岳麓山下

2007年4月6日

目 录

导论 农民组织化:一个重大而现实的研究课题	(1)
第一章 组织起来:改变农民弱势群体的命运	(28)
第一节 当代中国农民的基本状况考察	(28)
第二节 组织起来是农民改变弱势群体命运的基本 途径	(36)
第三节 组织起来是维护农民权益的基本保障	(45)
第四节 加强农民组织建设的紧迫性	(61)
第二章 农民组织化是现代农业的推进机制	(67)
第一节 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及其困境	(67)
第二节 农民组织化是现代农业的有效推进机制	(74)
第三节 农民组织化是对接现代市场的有效途径	(80)
第三章 农民组织建设是新型农村发展的基础	(91)
第一节 农民组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组织 基础	(91)
第二节 农民组织与农村社区治理	(103)
第三节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会转型	(115)
第四章 农民组织化:理论与实践	(12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农民组织问题的 理论	(124)
第二节 现代西方关于民间组织与社团的理论	(138)
第三节 合作社运动:农民经济组织化的世界实践	(148)
第五章 中国农民组织形态的历史回顾	(159)
第一节 封建宗法治理下的农民组织形态	(159)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农民组织	

形态	(166)
第三节 互助合作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组织形态	(177)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的农民组织状况	(187)
第六章 农民组织与“三农”发展的国际经验	(198)
第一节 世界各国的农民组织	(198)
第二节 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农民组织	(205)
第三节 现代农村建设与农民组织	(214)
第四节 农民地位改变与农民组织建设	(224)
第七章 当代中国农民组织的体系结构与基本使命	(235)
第一节 经济领域的农民组织	(235)
第二节 政治领域的农民组织	(246)
第三节 社会文化领域的农民组织	(258)
第四节 当代农民组织的基本使命	(265)
第八章 农民组织化的实现途径	(272)
第一节 农民自身的觉悟和行动是实现组织化的根本 条件	(272)
第二节 政府的积极支持与法律保障	(278)
第三节 社会各界的配合与支持	(291)
结语 农民组织与和谐农村建设	(298)
后 记	(311)
参考文献	(313)

导论 农民组织化：一个重大而现实的研究课题

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历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农业社会。在社会变迁、文明演进的历程中，农民成为基本的推动力量。时至21世纪的今天，农民仍然是中国人口最多、地域分布最广泛的一个群体，担负着为13亿人口提供粮食副食、为国家经济发展和重大工程建设提供积累和劳务的艰巨使命。

农民问题从来是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农民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生活状况直接决定着农业与农村的发展进程，影响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目标。同时，也紧密关联着千千万万从农村走出来、现在在城市从事不同职业的工作者的认知与情感。本人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从事过典型的农民职业，亲属戚友相当部分仍在农村。尽管离开三十余年，故乡的农村，仍然是我梦萦之所在，心灵之港湾，情感之归宿。对家乡的变化和父老乡亲的处境，时常挂怀心系。有时候想，自己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或社会显要，对乡梓父老，在经济上、技术上无法效上绵薄之力，但能否记载或反映一下家乡的情况，为农村面貌与农民处境的变化，提点建议、做点呼吁，虽然起不到多大作用，即使慰藉一下心灵，也算不辜负养育之恩。2006年，我有幸脱产到湖南大学做访问学者。经导师罗能生教授的指导，决定把“三农”问题的研究，结合多年来对故乡、对农村的一些感慨与思考，用文字反映出来。于是形成了“新时期‘三农’事业与农民组织建设问题研究”这篇书稿。

在我的感知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经受了剧烈的变化。先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二十多年来一直在集体生产队出工劳动、分粮分物，像大家庭生活一样的农民，一下子变成了“单

干户”。出工形单影只，耕作默静无声，一时弥漫着失落、茫然、无所适从的情绪。随着地里庄稼的茁壮成长，失落的情绪逐渐被发家的希望所取代，挥汗如雨，早出晚归，男女老幼奋战大田。一分汗水换来一分收成，农民的仓储充盈起来，“瓜菜代”的日子成为过去。

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并不是就没有了其他烦恼。农用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乡亲们生产的粮食、鸡鸭、瓜果、烤烟卖不起价，而且因干旱水涝疫病虫害等使收成不可预期。加上上交钱粮不断增多，家庭开支越来越大，一年下来，手中没有几个钱。“种田不划算”成为乡亲们的普遍认知。90年代初期，乡亲们开始成群结队往广东沿海一带跑，往认为能挣钱的任何地方跑。“打工族”成了相当部分青壮年农民的基本选择。责任田被低息或无息转包，甚至被抛荒。

“打工”同样是一条充满了荆棘与风险的道路。缺少文化知识、专业技术以及城里生活经验的农民，只能从事高强度、大时量、低收入的工作，而且极不稳定，随时受停工、辞退的威胁，饱受抛妻离子、颠沛游离之苦。与“打工族”相对应，家乡农村成了妇女、儿童、老人的“留守处”，平时难看到几个青壮男人，大田里主要是女人的身影。家庭妇女承担了大田耕作、副业饲养、顾老护幼、看门守户的全部职责。听乡亲们说，有时候村中办丧事，500余口人的村子竟找不齐8个抬棺木的扛夫。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只有极少数闯出了前途，多数人是城里的“长工”或“季节工”，年初出去、年尾回来，有时农忙也回来，年复一年，没有改变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近年各种上交费用减少，农业税被取消之后，不少在外打工的人又回到家乡种粮种烟了。回家干老本行，与家人团聚在一起，避免颠沛流离，生活可以安定一些，但能否强于打工、保证经济收入稳步提高，却是个未知数。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乡开始变得陌生。在乡亲们餐桌内容丰盛起来、年轻人衣着不断光鲜的同时，村中水泥盖顶的红砖小楼不

断多起来，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原村址的四周。一座小楼圈占一片土地，原来聚居的村落变成了无数相互独立的小庭院，记忆中的村庄面貌荡然无存。路边与田埂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周围山岭上却光秃秃看不见一棵树，以前常年流水潺潺的渠道干涸了，山塘淤满了，田间小道的路基崩塌了，村集体的公房、仓库被拆、被分不存在了。白天可见地里零散的劳作身影；一到晚上，户门紧闭，鸡鸭猪牛被集中关在最坚固的房舍，由男人守护着。除了偶闻电视播放声，难得有人在外活动，整个村野一片寂静。曾经有过的喧腾、热闹、和睦的乡村气氛，已无处可寻。

近二十多年来，世界变化迅速，国家发展迅速。家乡也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却酸甜苦辣五味俱全。虽物质生活有所提高，乡村的社会风气、精神面貌却给人今不如昔之感。笔者感触最深的是人心散了。各人（包括村干部）只管种自己的田、修自己的屋，一切只为自己着想，公众之事、别人之事，无人关心，连大白天滥伐公林、拆路基垫房基、收割别人庄稼这样的事都无人过问。至于村庄发展、农业改造、鳏寡孤独照应之类，恐怕更无人过问了。有时笔者不免自问：过去纯朴清朗、井然有序的民风哪里去了？善良敦厚的乡亲哪里去了？如果照这样下去，农村能小康吗？能和谐吗？实现了小康又如何？家庭经营实质是小农单干的代名词，如果说祖祖辈辈是这样走过来的，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就是小农社会，而且祖辈们走得又是何等的艰难。现在已到了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时期，还能沿着老辈人的脚步走吗？乡亲们生息繁衍的村庄内部诸多事务，开始有宗族组织管，以后有集体组织管，现在有谁在管？无人管或管不好都牵涉到八九亿农村人口的生存环境问题。中国太大，农村太宽，没有谁能包办起来，只有靠乡亲们自己，靠乡亲们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就能做好单家独户许多做不来的事情。

一、时代需要农民组织起来

(一)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需要农民组织起来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几代人的强烈愿望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道路,实事求是地提出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阶段目标,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在 21 世纪前 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也是 13 亿中国人利益和价值的诉求。

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是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和本质要求

“小康社会”是我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构想阶段性目标的“中国式”表述。1979 年 12 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最低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1987 年 4 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当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把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设想以党的文献形式确定下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 20 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从此,“奔小康”成为广大城乡居民投身国家现代化建设,改变自身生活处境的有力口号。

经过 20 年的努力,我国顺利完成了现代化建设项目的前期任务。到 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80 年增长 6 倍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455.7 美元增加到 850 美元。这段时间,经济社会持续地较快发展,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落后状况有所改观,告别了粮食短缺时代,解决了 12 亿多人口的

吃饭问题。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宣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然而，“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状况。“总体小康”背后还存在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三农”问题，即绝大多数农村的农民生活与小康水平相距甚远。为了解决“总体小康”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推进我国现代化向更高阶段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含了和谐社会的内容。如果说全面小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总体目标的话，社会和谐则体现全面小康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国际上出现过经济快速发展与贫富急剧分化的“拉美化”现象，决不应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演。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任务之一，推动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机制。2006年10月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农民组织起来

建设全面小康与构建和谐社会,其重点和难点在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总体小康”中存在的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突出反映在“三农”上;总体和谐下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也基本集中在“三农”问题上。能否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决定着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和成败;而能否使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决定着“三农”问题解决的进程和成败。以组织化机制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基本权益,发挥农民的主力军作用,成为建设全面小康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1)建立全面小康的经济基础需要农民组织起来。“全面小康”不可能建立在传统小农分散落后的经营模式上,必须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组织形式的条件加以支撑,创造出更高的生产率,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农业现代化是农村“全面小康”无可选择的必需条件。我国人多地少、耕作技术陈旧,基础设施落后,尤其是单家独户的小农经营模式,无论是个体生产能力还是资本积累,都难以采用先进技术设备,也难以在较短时期发展大规模农场经营。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另辟蹊径。“我们只能在农民家庭经济 and 有限土地的前提下,以生物技术和集约经营来进行土地替代,通过农民联合与合作,在区域化种植、规模化养殖、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领域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大生产,创造聚合规模经济、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①以创新农民组织方式来改造落后农业,推进现代农业,是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的基本条件。

(2)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农民组织起来。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体制。国家运用市场轨道推进现代化建设事

^① 牛若峰等著:《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业、引领“全面小康”的建设进程，发展市场经济是全党全民的中心任务。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发展规模经营、资源优化配置，注重生产效率和效益，强调竞争力和创造力。在市场经济下，各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的利益目标，也必须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得以实现。我国农民分散落后的经营方式，与市场化体制显得极不适应，使得农村的市场化水平和农民进入的市场能力极低。个体农户往往依靠非常有限的土地、劳动、资金这些传统生产要素和传统的经营方式与实践经验，来谋取生活，没有条件去重视知识、信息、技术这些新要素和进行经营模式创新。其结果不仅注定个体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输家，而且严重影响国内市场的均衡发展，影响中国市场向世界的扩张。要使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有机会成为赢家，必须改变经营方式和市场进入方式，组织起来闯市场，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或专业协会，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3)健全民主法治、实现公平正义需要农民组织起来。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健全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实现各阶层之间的公平和正义，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对民主权利和公平正义的冀求，比其他社会群体更为强烈。长期以来许多制度政策安排具有明显的伤农、损农特征；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益到农民身上就被打折扣，如选举、结社、村民自治等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现实生活中的农民成为各种强势集团欺凌和侵害的对象，而且还难以得到司法、行政的公正裁决；进城、转行的农民工其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工伤救济等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或单位正式职工的同等待遇。农民民主权利和公平正义的缺失，使社会政治生态失去平衡，成为不和谐因素，隐伏着严重的问题甚至危机。

构建和谐社会，要高度重视农民民主权利和公平正义缺失的问题。近几年政府采取的许多亲农、善农的政策措施，表明正在往这方面积极努力。温铁军认为：“无论怎样谈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

控和善意、善政,都还有待于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①农民组织起来,广泛参与政治过程,有利于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监督施政环节的公正性;有利于抗衡各种强势集团对农民利益的侵害;有利于增强农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发展基层民主,加强自我教育和管理,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群众矛盾,降低政府的对话成本,促进社会安定和谐;有利于运用组织机制实现农民自我服务、自我发展,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

(二)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农民组织起来

1. “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1990年以来,我国“三农”问题愈演愈烈,农民成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也受到“三农”问题的严重制约,解决好“三农”问题已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生活处境艰难。改革开放初期,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黄金时期,1978—1984年,年均增长14.69%;但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1986—1990年,年均增长降到4.7%;到1991—1995年,快速下降到年均增长率1.8%;1997—2003年,年均增长率徘徊在4%左右。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却一直持稳步增长态势,于是,就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从1978年的2.57:1,扩大到2003年的3.23:1。这仅仅是收入数据上的对比,如果把城镇居民的公共福利加上,再考虑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与再生产成本,则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应在5~6倍。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同时,农民负担却在不断加重。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留、五统筹”、加上地方政府和部门的“三乱”(指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等,名目繁多,弄得农民不

^① 温铁军:《缓解“三农”问题需要制度创新》,载田永胜主编:《中国之重:32位权威人士解读“三农”问题》,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